

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初探

姜道章

通常我們說一個人是甚麼人，表示他（或她）是某一個國家的公民，是從該國來的，例如我們說他是美國人，就表示他是美國的公民，這是從法律的觀點來看的，就是說他具有美國的國籍。在一個國家內部，則表示他是從哪一個行政區來的，例如我們說一個人是湖北人，表示他是從湖北省來的。就居住地決定一個人是甚麼人，可能會改變，例如湖北省英山縣，在清代屬於安徽省，英山人就是安徽人，後來英山劃歸湖北省，英山人就變成了湖北人。所以，說一個人是甚麼人實在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。我們棗陽人是從哪裏來的？我們棗陽人是如何形成的？的確值得探討。

一、棗陽人的定義與棗陽的範圍

究竟誰是棗陽人？棗陽人的定義為何？有必要先弄清楚，大概符合下列三個條件之一者，應該說就是棗陽人：第一，父母是棗陽人自己又出生在棗陽，無疑就是地道的棗陽人；第二，一個人在棗陽久居，浸潤于棗陽的生活習慣，會說棗陽話，認同棗陽，就是棗陽人；第三，一個人的父親是棗陽人，不論他（或她）住在哪裏，習慣上或法律上，他（或她）就是棗陽人。棗陽人應該會說棗陽話，會說棗陽話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，也就是鄉音。今天我們遇到的北京人，不少是滿洲人，他們出生在北京，久住北京，說北京話，就說自己是北京人。說同一方言的人會自認是同鄉，鄉音是同鄉之間最有力的聯繫。作者的大外甥女婿是河北人，棗陽出生，講一口地道的棗陽話，

是百分之百的棗陽人。不過在外地或海外成長的人，雖然父親或父母都是棗陽人，但是可能不會講棗陽話。棗陽話除了口音腔調特別，棗陽話形成獨特的方言，有些土詞，如父親叫伯伯，上午叫前半，說話做事莽撞的人叫雷轟。現在交通方便，電視廣播無遠弗屆，普通話越來越流行，幾乎全國人人講普通話，各地講的普通話，基本上是一樣的，可能只有口音差異而已，有一天地道的棗陽話會消失。

本文所說的棗陽，指現在棗陽市所轄的範圍，隋代的舂陵郡，郡治設在棗陽，範圍比現在棗陽市的範圍要大許多（註一）。棗陽縣一名，距今已經有一千四百餘年的歷史了，一直使用到1988年建立棗陽市為止。棗陽縣原來是棗陽村，最遲在公元601年已經有棗陽村了，棗陽一名的歷史更久，但確實始於何時待考（註二）。

在棗陽縣一名出現以前，棗陽稱為舂陵，那時的棗陽人則是舂陵人。

二、遠古的棗陽人

棗陽人是慢慢形成的，就現有的考古知識來說，雕龍碑人可能是最早的棗陽人，鹿頭鎮邱莊村境內的雕龍碑遺址，位在沙河的北岸，初步判斷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，距今約五千到六千年，他們是從北方黃河流域遷移來的，應無疑義。

其他攷古遺址有商代（公元前16-12世紀）的毛狗洞，位在梁集花園村，滾河的北岸；西周（公元前12世紀至771年）的象弓河，位在新市附近沙河源的西岸；春秋（公元前770-476）的曾國墓葬，位在熊集段營滾河南岸；西周的閻家小河，位在鹿頭閻家小河村沙河源的西岸；戰國（公元前475-221）的老墳岡，位在吉河南鄧店沙河北岸。這些遺址都位在沙河與滾河岸旁，可能說明從商代到戰國的大約一千到一千兩百年間的棗陽人，大概都分布在沙河與滾河河谷，既靠近水源，又可避

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初探

免水災的河坎上。無疑他們是雕龍碑人的後代和後來從北方黃河流域遷移來的。雕龍碑、毛狗洞、象弓河、閻家小河及老墳岡，都位在河流的北岸或西岸，可能跟古代棗陽人從北方遷到棗陽有關，住在河邊，既有水，河流也有防禦保護的作用，那時的棗陽森林豐茂，必多野獸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作者年幼時棗陽還有狼傷人，何況古代。

三、古文獻記載遷移到棗陽的移民

漢代春陵侯從湖南遷移到棗陽，漢文帝的曾孫劉買封春陵侯，劉買是劉秀的高祖父，武帝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）劉買封為春陵侯，封地在今湖南省，漢代零陵郡冷道縣春陵鄉，元帝初元四年（公元前45），劉買的孫子劉仁，以春陵地勢下溼，山林毒氣，上書求減邑內徙，元帝許之，劉仁留下兒子劉昌在原封地，看守祖墳，自己與劉回等族人遷到南陽郡

蔡陽縣白水鄉，保留原封地的名稱，改白水鄉為春陵鄉，白水鄉當今棗陽吳家店一帶。漢高祖是今天的江蘇人，棗陽劉家在湖南住了大約八十年，也可以說是湖南人，棗陽劉家是在兩千零五十二年以前從湖南遷移到棗陽的，所以我們可以說今天的棗陽人的祖先有些是從江蘇和湖南來的（註三）。

歷史上我國人口遷移的大趨勢，主要是從北方向南方遷移，自西向東有三條最重要的遷移路線，中間的一條就是漢水和唐白河，位在武當山和桐柏山之間的南陽盆地為必經之地，我們棗陽就位在盆地的南緣，古代有大量人口從北方遷移到南陽盆地。有三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：第一次發生在公元三世紀末和四世紀初，西晉元康元年（公元291）開始八王之亂，永嘉五年（311）發生永嘉之亂，大量人口為了避亂，從中原遷往長江中下游。第二次發生在公元六世紀中葉，唐天寶十四年（755）至廣德元年（763）發生安史之亂，

李白詩云：「三川北虜亂如麻，四海南奔似永嘉」（註四），持續八年結束，大約有兩百五十萬北方人移居南方。第三次公元十二世紀初葉，靖康元年（1126）金兵攻陷宋朝都城開封，宋欽宗和退位不久的徽宗淪為俘虜，史稱靖康之亂，大約有五百萬北方人逃到比較安全的南方。

上述三次人口的大遷移，無疑有不少人在棗陽定居下來。古代我國北方人口較南方多，長江流域和更南的西江流域，雨量比北方多，溫度也較高，有利於農耕，人口又相對稀少，所以吸引大量北人南移，遇有戰亂和荒年，南遷的人口更多。第一次人口大遷移，移民高潮歷時一百多年，大量人口南渡，中線的水路是循漢水南下，以今天甘肅、陝西、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為主，襄陽成爲移民重要的集散地之一，肯定有人在棗陽定居下來（註五）。

南朝宋（420-479）的寧蠻校尉、雍州刺史、襄陽太守劉道產，「善于臨民，在雍部

政績尤著，蠻夷前後叛服不受化者，並皆順服，悉出緣沔爲居。百姓樂業，民戶豐贍」（註六）。當時漢水流域山區的蠻人，下山遷到低地居住，南北朝時漢水稱爲沔水。在此以前，襄陽已有蠻民，《宋書》宗越傳提到蠻民出入襄陽城（註七）。北周天和二年（567），伊婁穆鎮壓唐州山蠻，「蠻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，穆分軍進討，旬有四日，竝破之，虜獲六千五百人」（註八）。南朝境內規模較大的幾次遷移發生在宋元嘉年間（424-453），元嘉十九年（442）劉道產死後，「群蠻大動」，遣沈慶之征討，「大破緣沔諸蠻，禽生口七千人。進征湖陽，又獲萬餘口」（註九）。唐州在今河南唐河，石窟很可能在桐柏山中，也就是棗陽的東北境；湖陽就是今天河南唐河的湖陽，靠近棗陽北境。根據這些零星歷史記載，我們說也有蠻人遷移到棗陽，應該是合理的判斷。

靖康以後的北方人口南遷規模極大，形

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初探

成我國歷史上漢人南遷的第三次高潮。靖康元年（1126）金兵侵犯今天的山西時，「士庶攜老提幼，遷入穎、襄、鄧逃避者，莫知其數」（註十）。南宋建炎元年（1127），郭京自開封率部兩千人至襄陽府（註十一）。紹興十年（1140），岳飛率部自中原南歸，北方人民「從而南者如市，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。」這些北方人民被安置在漢水流域六郡（註十一）。

南宋嘉定（1208-1224）末孟宗政知隨州棗陽軍時，有大量北方人口遷移到棗陽，《宋史》孟宗政傳載：「孟宗政字德夫，絳州人。父林，從岳飛至隨州，因家焉。……宣撫使吳獵奇之，補承節郎、棗陽令。……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。宗政發廩贍之，為給田、創屋與居」（註十三）。南宋嘉定十年（1217），金人攻打襄陽和棗陽，給襄棗人民造成巨大損失，但由於遷入的移民數量較多，但從岳飛收復以後，「凡一百三十年，生聚繁庶，不減昔

日」（註十四）。絳州即今山西新絳，狹義的中原指河南省，廣義的中原指黃河中下游地區，換言之，棗陽人的祖先有些是從北方遷移來的。

元代（1271-1368）末年，南瑣、北瑣紅軍以襄陽一帶為根據地起義，朱元璋「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，空其地，禁流民不得入」（註十五）。明初開始，以江西人為主的移民已經進入了這一地區。正統元年（1436），李新奏稱：「河南南陽府鄧州、內鄉等縣及附近湖廣均州、光化等縣，居民稀少，郊野荒蕪，各處客商有自洪武（1368-1398）、永樂（1403-1424）間潛居于此，娶妻生子成家業者，叢居鄉村，號為客朋，不當差役，無所鈐轄。」他並建議對這些流民「驗丁入籍，撥與絕戶荒田耕種，納糧當差，仍移文原籍勘實。……戶部覆奏，從之」（註十六）。這說明當時鄂北有江西人移入，從江西到鄂北有兩條路線，水路沿漢水而上，陸路必經過棗陽，自然

有些人會在棗陽定居，棗陽有江西會館可為明證。

總之，根據零星的古文獻的記載，可知歷史上有今天的北方和西北人民遷移到棗陽，包括今天河南、山西、陝西，甚至山東、河北及甘肅等省的移民。近年來，有關國人免疫球蛋白同種異形分布的調查，顯示居住在北緯三十三度線以北的南方北部區域的人群，與秦嶺、淮河以北的北方人群同屬於一個集群，棗陽位在北緯三十一度四十分至北緯三十二度三十分之間，正好在南方北部區域內，說明棗陽人主要是北方人的後裔（註十七）。元代開始有江西人遷移到棗陽。

四、近代和現代遷移到棗陽之移民的移入

不少棗陽人的祖先是在明清時代從江西遷移棗陽的，清代魏源曾說：「當明之季世，張（獻忠）賊屠蜀民殆盡，楚次之，而江西少

受其害。事定之後，江西人入楚，楚人入蜀，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，湖廣填四川之謠」（註十八），有大量江西人移入整個漢水流域。漢水流域，特別是山區和岡地區域，人口比較稀少，據何炳棣的研究，從美洲引進的玉蜀黍，在十八世紀已在漢水流域大量栽培，玉蜀黍可以栽培在山區和岡地區域，所以才能提供移入人口的糧食供應，乾隆時期（1736-1795）各地有江西會館出現，可為明證（註十九）。例如棗陽顏家，大約在公元十五世紀中葉（約當明英宗正統年間）從江西永新遷移到湖北漢川，後來從漢川遷移到襄陽，最後從襄陽遷移到棗陽南鄉定居。顏家的始祖是從山東，南遷到江蘇，再遷到河南，繼之遷到陝西，最後從陝西遷到江西（註二十）。

棗陽姜家大約最遲是在十五世紀初已在棗陽定居，明宣德（1426-1435）年間姜家出了一位貢生姜信，後來到正德（1506-1521）年間姜家又出了一位貢生姜昂（註二十一）。據家二

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初探

姊告訴作者，作者的太爺曾從江西帶回來一位太太，過世後埋葬在城北，可能到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，與江西老家還有些聯繫。

大約清代到1949年，棗陽有不少外地商人到棗陽做生意，特別是棉花、棉線及土布的買賣，1990年的《棗陽志》有下列記載：

「三原、太谷經營布店與當舖巨商，住棗數十家」（註二十二）。

「1919年，……有山西、陝西、黃陂、孝感商人來棗陽經商，僅縣城就有外商三十多家」（註二十三）。

1937年棗陽有棉花行三百六十二家，縣城有專營花行十八家，「當時來棗陽設行的有漢口人，稱漢幫，較大的有德盛源、新興、黃森記等；山西人在此開行的稱晉幫，較大的有同興源、德泰永等；河南人在此開行的稱豫幫」（註二十四）。

「本縣土織土紡歷史悠久，清朝發展很快，山西、陝西等省客商來棗陽做土布生意，

大發其財，並在縣境內建有山西會館、陝西會館多處」（註二十五）。

民國初年日本人調查資料也顯示，棗陽縣城經營布店者多為山西人和陝西人（註二十六）。

《棗陽縣志》謂：「外來有所謂黃幫、西幫者，黃孝人多以小貿漁利，山陝人多營業典當錢鋪布店」（註二十七）。黃幫指黃岡商人，西幫指山西商人，黃孝人指黃陂、孝感商人。

這些山西、陝西、河南，以及湖北漢口、黃陂、孝感的商人，有不少最終在棗陽落戶，成為棗陽人。據作者所知，位在城關鎮順城灣的江西會館和北關盡頭的山西會館，規模都很大。《棗陽志》謂晉陝會館有多處，可能不只這兩處。另有位在靠近大十字街的大南街東側有黃陂會館，雖然規模小些，但都足證明晉陝兩省和黃陂商人很多，才有能力建築會館。《棗陽志》沒有提到江西商人，但城關鎮卻有

很大的江西會館，作者小學和初中都曾在江西會館上課，棗陽一定有大量的江西移民，所以才規模很大的會館。

抗戰勝利前作者在家鄉，親見到河南商人在棗陽做生意，小學中學有同學齊國政，齊家在大北街做生意，齊家是河南懷慶人。書院街的澡堂新生池老闆、大東街縣立衛生院的院長、及書院街南側當舖織布廠的老闆，也都是河南人。順城灣有些回回，並有一座清真寺，他們的原籍都是河南人；回教大概的清初傳入棗陽，清真寺建于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現任阿訇為河南人（註二十八）。1982年棗陽有回族兩千三百多人，回族人口的分布，北半部佔四分之三，這說明回族是從河南遷移來的（註二十九）。上述作者的大外甥女婿是河北人，作者的二外甥女婿和三外甥女婿都是山東人。作者的二伯母是四川人，作者的堂姐夫一家是黃陂人，都在棗陽定居下來。例子很多，不勝枚舉。

北鄉姚岡有一個村莊叫做「蠻子營」，據傳，清朝時，一家黃姓漢川人逃荒至此安家落戶，當地人稱南方人為蠻子，故名」（註三十）。東鄉劉升有一個村莊叫做「陝西莊」，「一家陝西的商人在此定居得名」（註三十一）。

1968年「安置丹江水利樞紐工程淹沒區移民，其中楊壩區安置二十五戶，一百零八人；平林區遷入八十三戶，六百八十三人」（註三十二）。

總之，這些零星材料指出，近代和現代遷移到棗陽的移民，外省者有河南人、山西人、陝西人、江西人、河北人、山東人、四川人；省內有漢口人、黃陂人、孝感人、漢川人。丹江水利樞紐工程淹沒區的移民，推測可能是過去的均縣人。

五、民間傳說山西大槐樹人 遷移到棗陽

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初探

民間傳說，山西大槐樹人遷移到各地，據說有些棗陽人的祖先，的確是從山西大槐樹來的（註三十三），明初從山西洪洞等地遷出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、河北、山東、北京、安徽、江蘇、湖北等地，少部分遷往陝西、甘肅、寧夏地區。民間流傳一首民謠：「問我祖先何處來，山西洪洞大槐樹。祖先故里叫甚麼，大槐樹下老鴿窩。」傳說當年移民時，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為記。至今凡大槐樹移民後裔的小趾甲都是兩瓣。「誰是古槐遷來人，脫履小趾驗甲形」（註三十四）。

六、在棗陽做官的外地人

明清兩代棗陽知縣、教諭、訓導、都司的籍貫，至少有下列各省及省內各縣市（註三十五）：

直隸、四川、江西、河南、山東、山西、廣東、浙江、雲南、廣西、江南、貴州、陝西、江蘇、福建、安徽、湖南、廣西、甘肅。

應城、黃岡、黃陂、大冶、鍾祥、黃梅、江陵、荊州、沔陽、崇陽、嘉魚、鄖陽、襄陽、通城、天門、武昌、雲夢、江陵、荊門、江夏、孝感、潛江、宣恩、武昌、枝江、蒲圻、黃安、松滋、咸寧、穀城、恩施、潛山。

民國時期棗陽縣知事、縣長的籍貫，至少有下列各省及省內各縣市（註三十六）：

山西、河南、福建、安徽、浙江、河北、江蘇、江西、四川。

興山、黃陂、蘄春、鄖陽、應山、南漳、孝感。

1949年以來棗陽縣長、副縣長、市長、副市長的籍貫，至少有下列各省及省內各縣市（註三十七）：

河北、山東、河南、遼寧、均縣、南漳、宜城、襄樊、新洲、鄖縣。

1949年以來棗陽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、副主任的籍貫，至少有下列各省（註三十八）：

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廣東。

因貪污案件海內外知名的前棗陽前市長尹冬桂，據說是河南人。

這些在棗陽做官的人，其中可能有些最終會在棗陽落戶。

七、在外地做官的棗陽人

當代大約有兩萬棗陽人在外地，約有三分之一在襄樊，五分之一在武漢，五分之一在湖北其他縣市，超過六分之一在北京地區，剩下的分散在大陸各地，這是二十世紀末的情形，現在的情形大概還是這樣（註三十九）。

此刻我們無法知道明清時期有多少棗陽人在外地，但在甚麼地方卻有資料可查，民國十二年出版的《棗陽縣志》顯示，那時至少有棗陽人在下列各省及省內各州縣工作過（註四十）：

河南、河北、江蘇、浙江、四川、廣東、

貴州、山東、陝西、安徽、甘肅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廣西、雲南。

安陸、黃州、荊州、應城、黃岡、黃梅、漢陽、嘉魚、長陽、沔陽、蘄水、通山、興山、巴東、黃安、當陽、保康、武昌、房縣、江陵、松滋、潛江、竹山、襄陽。

這些明清時期在外地的棗陽人，都是男性，其中可能有些最終會在外地落戶，但是一定也有些會在外地娶了當地女性為配偶，傳統中國人講究葉落歸根，最終攜眷返鄉，換言之，也就是有些外地人以棗陽人配偶的身份遷移到棗陽。

八、結語

根據以上有限材料的分析，此處的結論是暫時的，要獲得對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進一步的了解，須要詳細的調查研究。

棗陽位在南陽盆地的南部，具有中央地理位置的優點，有利於我國各地區人口從四面

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初探

八方移入。棗陽人來自許多省份，但以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、江西為主；也來自省內許多縣市，但以黃陂、孝感為主。棗陽話中有兒化，例如，家二姊暱稱四女兒為小四，發音不是 *xiāosi*，而是 *xiāosier*，表示受北方話的影響，是北方移民帶來的。從風俗習慣的特徵，以及從主要姓氏的結構來看，棗陽比較接近河南的情形（註四十一），可見河南在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中，具有很重要的地位，這自然是受兩者地緣關係的影響所致。跟中國大多數地方一樣，現代棗陽人是先後從全國各地遷移到棗陽移民的後裔。

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棗陽才開始有簡陋的汽車路（註四十二），現代交通工具汽車引進棗陽以前，交通不便，絕大多數棗陽人從生到死一輩子生活在棗陽，生活在自己的村莊，活動的空間範圍，最遠到達的地方大約限于趕集走路一天可以來回的本鄉鎮集市，這就是人類學者所說的「市場區」，大致相當於一個鄉

鎮，由於這種孤立性，幾千年來慢慢長期融合形成了棗陽的風俗習慣和語言，形成了棗陽人。

註釋：

註一：隋代的舂陵郡，治所在棗陽，舂陵郡可能是有史以來以棗陽為中心轄區最大的行政區域，轄棗陽、舂陵、蔡陽、清潭、上馬、湖陽六縣，其中前四者在今棗陽市境，湖陽縣一部分，也可能在今棗陽市境。

註二：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二十一載：「棗陽縣：上，東南至州二百里。本漢蔡陽地，屬南陽郡，後漢分蔡陽立襄鄉縣，周改為廣昌，隋仁壽元年（AD601），改為棗陽，因棗陽村為名也。」見唐李吉甫撰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元和八年（AD813）成書，萬有文庫本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），第3冊，頁594。

- 註三：范曄撰，《後漢書》，點校本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1），卷14，城陽恭王祉傳，第二冊，頁560。
- 註四：李白，「永王廔巡歌十一首」，載《全唐詩》，卷167。
- 註五：葛劍雄、曹樹基、吳松弟合著，《簡明中國移民史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146-148。
- 註六：沈約撰，《宋書》，點校本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卷56，列傳25，劉道產傳第六冊，頁1719。
- 註七：見前揭《宋書》，卷83，列傳43，宗越傳，第六冊，頁2109。
- 註八：見令狐德棻等撰，《周書》，點校本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1），卷29，伊婁穆傳，第二冊，頁500。
- 註九：見前揭《宋書》，卷77，列傳37，沈慶之傳，第七冊，頁1996-1997。
- 註十：見前揭《簡明中國移民史》（頁301）引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64，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。
- 註十一：見前揭《簡明中國移民史》（頁301）引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4，建炎元年四月乙亥。
- 註十二：脫脫等撰，《宋史》，點校本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），卷365，列傳124，岳飛傳，第三十三冊，頁11391。
- 註十三：見前揭《宋史》，卷403，列傳162，孟宗政傳，第三十五冊，頁1221-12213。民國十二年鉛印本《棗陽縣志》孟宗政傳也錄載此事，見梁汝澤等修、王榮先等纂，《棗陽縣志》〔影印本；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69〕，卷26，第二冊，頁643-646。
- 註十四：見前揭《簡明中國移民史》（頁302）引周密《齊東野語》，卷五「端平襄州始末」〔點校本；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〕。

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初探

- 註十五：見前揭《簡明中國移民史》（頁388）引高岱《鴻猷錄：開設鄖陽》。
- 註十六：見前揭《簡明中國移民史》（頁388）引《明太祖實錄》卷42。
- 註十七：見鄒逸麟主編《中國歷史人文地理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1）（頁153）引趙桐茂等著，「中國人免疫球同種異形的研究：中華民族起源的「一種遐想」，載《遺傳學報》1991年第18卷，第2期。
- 註十八：魏源，《古微堂外集》〔1878年淮南書局刊本；1958年左右台北影印本〕，卷6，頁5。
- 註十九：Ping-ti Ho, *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, 1368-1953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), pp. 149-153.
- 註二十：見顏家德主編，《棗陽顏氏族譜》（2006年刊印），頁122-123。
- 註廿一：見前揭《棗陽縣志》，卷2，第二冊，頁457-458。
- 註廿二：王榮修等編，《棗陽志》〔北京：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，1990〕，頁171。
- 註廿三：見前揭《棗陽志》，頁253。
- 註廿四：見前揭《棗陽志》，頁261。
- 註廿五：見前揭《棗陽志》，頁271。
- 註廿六：《支那省別全志》，第九卷：《湖北省》〔東京：東亞同文會，1918〕，頁143。
- 註廿七：見前揭《棗陽縣志》，卷14，第一冊，308。
- 註廿八：趙爾謙，「棗陽清真寺概況」，《棗陽文獻》，第二十三期（2006），頁207。
- 註廿九：姜道章，《湖北棗陽鄉土志》〔台北：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，2007〕，頁114。
- 註三十：見《湖北省棗陽縣地名志》〔棗

- 陽：棗陽縣地名領導小組辦公室，1983），頁53。
- 註卅一：見前揭《湖北省棗陽縣地名志》，頁146。
- 註卅二：中共棗陽市委黨史地方志辦公室編，《棗陽五十年大事記，1949年10月至1999年12月》〔棗陽：中共棗陽市委黨史地方志辦公室，2000〕，頁130。
- 註卅三：李發強，「關於『古槐移民』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聯想：兼論移民湖北及棗陽之攷證」，《棗陽文獻》，第十二期，頁59-67。
- 註卅四：彭登輝，「漫談大槐樹移民」，《棗陽文獻》，第十二期，頁18-20。有關大槐樹的資訊極多，可上網查考。
- 註卅五：見前揭《棗陽縣志》，卷23，第二冊，頁490-508。
- 註卅六：見前揭《棗陽志》，頁367-368。
- 註卅七：見前揭《棗陽志》，頁384-386。
- 註卅八：見前揭《棗陽志》，頁374-380。
- 註卅九：見前揭《湖北棗陽鄉土志》，頁198。
- 註四十：見前揭《棗陽縣志》，卷22，第二冊，頁457-484。
- 註四十一：見前揭《湖北棗陽鄉土志》，頁186-187。
- 註四十二：棗陽最早可以通行汽車的路是在1920年開始籌建的，襄花公路棗陽境內的路段經七方、縣城、興隆、隨陽店，在1925年底才全線通車，而且還不是全天候的公路，「由于路面未鋪碎石，晴天灰塵滿天，雨天泥濘難行」。見朱文漢，「話說棗陽路」，載棗陽市政协文史資料委員會暨棗陽市交通局合編，《交通春秋》〔棗陽，1993〕，頁53。

特城寓所)

(1100七年七月二十日於美國加州福斯